（上接 4 版）

夏志清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但随着时日推移、教学相长，他对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愈加同情与肯定

李浴洋：这就说到您在《“文学科学”与“文学批评”——普实克与夏志清的“文学史”辩论》一文中，曾经对夏志清的文学观念的形成详加考证。您认为他在写作成名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其出发点固然是‘新批评’的文本中心论，但终点却是满怀道德热诚的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观”。强调夏志清在燕卜荪、兰色姆与布鲁克斯之外，还受到了利维斯的深刻影响，是您的重要创见。在《书信集》中，您是否又发现了更多可以丰富与补充这一命题的材料与线索？

陈国球：事实上，夏志清在1978 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序里就提到自己受到利维斯《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的影响。在阅读《书信集》时，我的确留意过夏志清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利维斯《伟大的传统》的。其实他阅读利维斯很早。在 2002 年发表的《耶鲁三年半》一文中，他提到自己早在上海期间就已经看过利维斯的《英国诗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与《重新评价：英国诗歌的传统与发展》（*Revaluation: Tradi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nglish Poetry*）。《书信集》可以印证这个说法，从中我们更清楚地知道他是比较晚才接触专门谈小说的《伟大的传统》，当然这本书也要到 1948 年才出版。

利维斯是剑桥文学批评学派的关键人物。而这一学派的其他代表，像瑞恰慈与燕卜荪，都对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坛产生过很大影响。他们基本都是做诗歌研究的，所以夏志清的学术之路也是从新批评到利维斯的英诗研究。

夏志清是在耶鲁读书期间开始涉猎小说研究的。《书信集》记录了他在耶鲁修过一门小说研究的课程。而他读《伟大的传统》，便是为了应付这门课，这时已是他的博士课程的后期。可以说，夏志清的文学观念正是在这一从英诗到英国小说的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此后，他写作博士论文以及初任教职时，仍然都是以英诗为主。但当他着手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他受到的《伟大的传统》的影响便浮现了出来。

不过，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主要是一部“文学评论集”。在夏志清写作时，他做的主要工作还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小说文本做出判断，以此去发现他眼中的“好的作品”。我说《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写作受到《伟大的传统》的影响，可以联系到他提出的“情迷中国”（“Obsession with China”，又译“感时忧国”）的观点。但必须说明的是，在 1961 年出版的《小说史》第一版中，夏志清并未提出这一看法。在 1971 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二版中，他才加入了《情迷中国：现代中国文学的道德包袱》（“Obsession with China: The 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这篇著名的论文作为附录，同时作为全书的“主线”。由此可见，夏志清的文学观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起初，他考虑最多的应当是“文学批评”本身的标准，即一部作品“好”还是“不好”，它的结构如何，它的技艺，等等。但在研究过程中，他开始考虑一部作品在“文学批评”以外的意义了，例如对于人生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对于民族国家的意义，等等。因此，他才会把“情迷中国”的说法补充进来。而《书信集》记录的便是他的这一思考过程，这对于我们更为准确地理解夏志清的文学观念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李浴洋：您对于夏志清的文学观念的理解似乎与学界的普遍认识有所不同。对于他提出的最具影响的“Obsession with China”的概念，您不同意通行的“感时忧国”的译法，主张应当译为“情迷中国”。而您也将自己的一部文集命名为《情迷家国》。这让我对于两者之间的关联不由产生了兴趣。能否请您解释一下您主张把“感时忧国”改译为“情迷中国”的理由，并且谈一谈您对于夏志清的这一提法的看法？

无论是从个体角度来说，还是从“时”、从“地”的意义上看，《书信集》都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文献。

陈国球：《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译本是由刘绍铭先生等人据原著第二版翻译，于 1979 年最先在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这一中译本已经收录了《情迷中国：现代中国文学的道德包袱》一文。该文由丁福祥与潘铭燊两位先生翻译，题目改作《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译笔流畅通顺，但也牺牲了许多原文的深义。自此以后，“感时忧国”一说，便不胫而走。我最早阅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版本，就是这一中译本。我对于“感时忧国”的了解，也是从此开始的。

后来我看到《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本，发现夏志清使用的原文是“Obsession with China”。“Obsession”一词在英文中包含有比较复杂的感情，但“感时忧国”就完全是歌颂爱国精神的正面意思了。这就启发我重读了《中国现代小说史》。我发现，在夏志清那里，“obsession”显然不是完全正面的。他讲“Obsession with China”，有一种认为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都把自己的感情过于陷溺在对于中国的迷思当中的意思。而在他的整个论述中，得到更高评价的明显是那些可以从对于民族国家的迷思中超越出来的作家。他认为这种对于中国的迷思，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的一种包袱。他说“obsession”，是带有批判性的。如果结合夏志清的文学观念进行理解，他的这一态度也就更加明确。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也是一位人文主义批评家。在他那里，民族国家并不是最高的评价标准。他更看重的是对于人性与社会的关怀，是对于道德的反思与追问。而在他眼中，绝大多数中国现代作家并没有做到这点。因此，我认为把“Obsession with China”翻译为“感时忧国”是不够妥当的，至少是不尽贴合夏志清的原意的。“情迷中国”的译法或许好一些。

在写作《情迷中国：现代中国文学的道德包袱》时，夏志清的基本看法是“情”代表了对于中国的付出，而“迷”则说明了这种付出是陷溺其间——换句话说，也就是缺乏批判性的。夏志清这样说，并不是主张不要付出，而是强调付出必须以清醒的思考为前提，同时最好也具有某种超越性的关怀。这大致可以反映他本人的文化与政治立场。但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他的这一立场后来发生了变化。他自己做到超越民族国家了吗？我认为没有。非但没有，而且随着时日推移、教学相长，他更沉潜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体味与省思。

例如，1979 年他在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过一本中文论文集《新文学的传统》。在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他是站在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视野中打量“中国现代小说”的；而到了《新文学的传统》结集的时期，他虽然仍旧坚持人文主义的立场，但对于“新文学的传统”本身却多了一些同情，少了一些批判。他更加肯定“新文学的传统”所具有的正面价值，欣赏富有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

而在他转向对于“新文学的传统”加以肯定的背后，是他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正如在“伟大的传统”背后包含的是对于一个“文化传统”的肯定，在夏志清眼中，中国同样也有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入世、关注人生，富仁爱精神。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这点并不突出。但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屡屡表示对《诗经》、古乐府、杜甫、关汉卿等人作品的重视和珍惜。事实上他本身就是“情迷中国”的一员。我想，夏志清的这一变化与他的人生阅历有关。尽管他十分强调文学的道德承担，并且认为道德承担与对于民族国家的承担之间保有某种张力，但对于后者，他也没法轻轻放下。随着他经历不同的人、事、时、地，他对中国文化有更深刻的思考，对于现代中国的文学与历史也就愈加同情与肯定。

夏氏兄弟、宋淇、吴兴华等人构成了一个松散的知识社群

李浴洋：您与夏志清的交往多吗？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您眼中的夏志清，又是怎样的？

陈国球：夏志清的成就很高，争议也很大。但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位有眼光的文学评论家，他有他独到的观点，而在他的观点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资源。不管我们是否同意他做出的具体判断，这些都是应当承认的。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他的著作比他的辩论文章更精彩，他的著作带给了我很多思考。

我与夏志清先生的交往并不多，印象中直接接触只有两次。一次是 2000 年夏先生来香港参加“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机会向他当面请益。还有一次是 2005 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夏氏昆仲与中国文学”学术会议提交《情迷中国》的论文，他来听会，我们也有过面对面交流。除去这两次，好像就没有再见过面了。但我读夏先生的文章著述，则早在 1970 年代开始。夏志清的中文文章，很早就从台湾地区传入香港；我在大学阶段常置案前。后来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部分章节的中译在《明报月刊》上发表，我也跟着读。出书以后，我在第一时间就买了。再后来，他成为我的研究对象，我自然也就把能够找到的他的中英文作品都读了。我的感觉是他的英文非常漂亮，文体庄重而典雅，而他的中文则十分轻快，活泼而灵动。他的英文是标准的学术语言，主要面向学术界发言，而中文则俏皮一些，更容易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我对于夏先生的印象，基本都是从阅读中得来的。

在我眼中，夏志清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无论对于学术，还是世事，他都有很强的洞察能力。但我们对夏志清的了解，其实还是非常不够。以他的学术而言，其中还有很多内容是我们并不清楚的。例如，有人认为夏志清不懂中国古典诗歌，事实上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为研究生开的三门课，首先就是讲“唐诗宋词”。经多年累积，他在这范畴下的功夫不会少。可是至今未见有他的正式论述流传，我们只能在《夏志清论中国文学》看到他的一部分比较负面的批评意见。但我注意到，1956 年陈世骧赴台讲学，讲的就是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话题。夏志清起初对于他的学术不怎么恭维。这在《书信集》中就有记录。但后来夏志清对于陈世骧的研究评价非常正面；陈世骧去世以后，他还专门写作了纪念文章，文中说自己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读得远不如陈世骧多。这一变化究竟如何发生？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李浴洋：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少有的在海内外学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引发巨大争议）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去年我访问文学史家吴福辉先生时，他曾提到北大学人对于这部著作的最早接触，便是得力于 1970 年代末期香港学生的私下携入。香港与夏氏兄弟仿佛具有一种

（下转 6 版）